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JIANGXISHENG ZHIXUE SHEHUI
KEXUE CHENGGUO WENKU

近代江西文存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ODERN JIANG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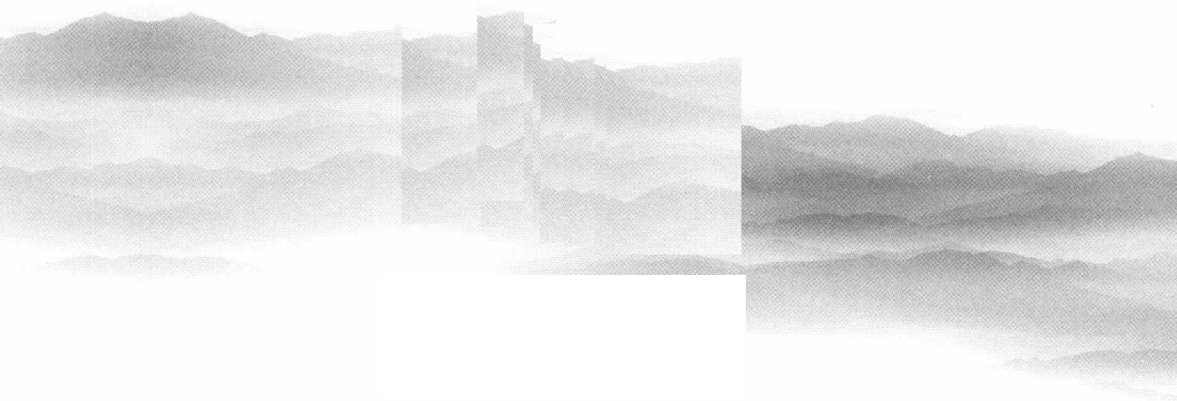
上官涛 胡迎建 编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近代江西文存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ODERN JIANGXI



上官涛 胡迎建 编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江西文存/上官涛,胡迎建编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6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5097-7493-9

I. ①近… II. ①上…②胡… III. ①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国-近代 IV. ①I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4798号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近代江西文存

编 注/上官涛 胡迎建

出 版 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王 绯 周 琼

责任编辑/赵子光 孙燕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政法分社(010)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7.5 字 数:591千字

版 次 /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7493-9

定 价 / 15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作为人类探索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成果，社会科学承载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特殊使命，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以创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引领全民共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这是时代发展对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

江西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称。千百年来，勤劳、勇敢、智慧的江西人民，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大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在这片自古就有“文章节义之邦”盛誉的赣鄱大地上，文化昌盛，人文荟萃，名人辈出，群星璀璨，他们创造的灿若星辰的文化经典，承载着中华文明成果，汇入了中华民族的不朽史册。作为当代江西人，作为当代江西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继往开来，不断推出新的成果。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给出科学的答案。汲取历史文明的精华，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新任务的要求，创造出今日江西的辉煌，是每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愿望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社会科学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价值在于推动社会进步、提升文明水平、提高人的素质。然而，社会科学的自身特性又决定了它只有得到民众的认同并为其所掌握，才会变成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因此，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和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其成果的运用、交流与广泛传播。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进一步繁荣发展，我们设立了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出版资助项目，全力打造《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由江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设立，资助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优秀著作出版。该文库每年评审一次，通过作者申报和同行专家严格评审的程序，每年资助出版30部左右代表江西现阶段社会科学研究前沿水平、体现江西社会科学界学术创造力的优秀著作。

《江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涵盖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收入文库的都是具有较高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具有思想性、科学性、艺术性的社会科学普及和成果转化推广著作，并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希望通过持之以恒地组织出版，持续推出江西社会科学的最新优秀成果，不断提升江西社会科学的影响力，逐步形成学术品牌，展示江西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群体气势，为增强江西的综合实力发挥积极作用。

祝黄河

2013年6月

前言

胡迎建

近代中国是政治制度转轨迅速、社会动荡剧烈的时代，在新旧交织、西学东渐的文学思潮中，近代文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散文”作为传统文学样式，得到空前发展，涌现众多的作家和作品。

道光年间，国门初开，鸦片战争发生。接踵而来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英法联军入京，内忧外患丛生，天灾人祸交加，大清帝国元气大伤。更因政治体制落后，士习衰恶，人才枯竭，吏治腐败，加剧了时势的衰变。由云龙说：“道咸以来，国事日非，非讲求经世之学，不足以济时；非主张通变之道，不足以应用。于是今文之学兴，公羊三世之学盛。其时学者如龚定庵、魏默深，皆今文学家，喜谈经济。”^① 龚定庵即龚自珍，浙江仁和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夜，他就觉察到这个时代“士不知耻，为国家之大耻”，“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鸿燕逝而已”；^② 魏默深即魏源，湖南邵阳人。他担心乱世将临，落入“乐生乱；乱久习患，患生忧……”^③ 的地步。

同治年间，依靠湘军与皖军的相继崛起，挽救了清朝廷覆灭的命运，史称“同治中兴”。随之而来的光绪年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给国人以极大刺激，要求变法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光绪帝谋求变法以致富强，抵

① 由云龙：《定庵诗话》卷上，张寅彭编《民国诗话丛编》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563页。

② 龚自珍：《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第1辑31~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1~32页。

③ 魏源：《默觚下·治篇二》，《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第39页。

御外侮，支持变法的官员与在野的有识之士形成互动之势。其时，西学东渐，维系国脉纲常的儒学与礼教也开始动摇，尚变维新思潮起伏。其时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政，康有为在京中联络当时的进步人士成立强学会，大造变法舆论。这一时期，江西籍人陈炽、文廷式、陈三立等均积极为变法奔走著书。陈三立不仅列名强学会，而且在湖南佐其父推行变法，引荐梁启超主办时务学堂。然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发动戊戌政变，捉拿维新党人，令“天下寒心”。继而是八国联军入京，慈禧挟光绪帝西逃西安。维新变法失败后，社会危机更加深重，伴随着思想文化领域内的除旧布新，各体新派文学相继崛起，士人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此时封疆大吏张之洞仍在继续调和汉学宋学之争，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也就是近代以降的时势变化。

近代江西先后出现不少古文大家。他们既以文学成就名重一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一时代的现实，国门洞开，英夷不断以鸦片荼毒生灵，随后而来的太平军攻入江西，对江西地方上造成极大震荡。这样的惨痛历史，在江西文人笔下，无不有切肤之恨、百端之忧，并为之筹策议论，希望上书朝廷或地方大吏。还有不少作品，补史志之不足，不少勇毅有为之士，才华英彦，在传记、墓志铭中为后人留下了生动具体的记载。

近代以来，学术文化一大变，从文化背景来看，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提倡经世以致用。康熙、雍正时期，宗法程朱，理学盛行，是谓宋学。至乾隆、嘉庆间，屡兴文字狱，学者多遁入书斋，缄默不言政治，海内竞尚考据，汉学盛行。于是宗宋学者讥笑汉学为钁钉，为琐屑，而固守汉学者则攻击宋学为空疏无用。在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危机中，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面临的危机。儒学要继续发挥其社会功能，就必须适应形势而有所创新。此时出现汉宋调和、汉宋会通或汉宋融合的趋势。而在江西作家中，他们对汉学、宋学都提出自己的见解，同时敢于批判传统儒学，特别表现在刘孚京、陈宝箴父子等人的论说中。

江西三面环山，北峙庐山，鄱阳湖汇入长江之口，又耸起石钟山；南昌附近蟠结西山、云居山；东部绵亘怀玉山、三清山、鹅湖山、龙虎山；东南拔起麻姑山、华盖山；赣中盘踞青原山，西障井冈山、武功山；赣南

横迤大庾岭等。其间众多山岭难以尽数。赣江、信江、抚河、昌河、修水五大水系注入鄱阳湖。山雄水秀，清代刘献廷比较江西与江南（江苏一带）山水时说：“江西风土与江南迥异：江南山水树木，虽美丽而有富贵闺阁气……江西则皆森秀疏插，有超然远举之致。吾谓目中所见山水，当以此为第一。”^①江西每一处山水名胜，都有其儒佛道文化，都有美好的传说，都有人杰活动于其间，人文底蕴丰厚。近代江西文人作品中，有不少游记，描述了江西山水自然美、风俗人文美。

道光、咸丰年间，禁鸦片烟名臣黄爵滋，既在古文实践中有较高成就，诚如自言“谬窃时望”（《仙屏书屋初集文录自序》），又在古文论方面有树立旗帜的言论。他曾追溯古文变通之道，反对“作者斤斤侈言家数，不思文以足言，言以足志，百变一宗，曾何畦畛？”主张“但应求之真，亦有本来。妍丑之实，岂能自掩？……文之为物，在唐宋而变益通，洎元明而变亦穷。虽然，变穷于文，不穷于道。以言乎文，则自皇古以历三代，其变已甚；以言乎道，则自秦汉以迄于今，其不变犹是。故曰修辞立诚，不诚无物，尔曹但无妄作可也”（《仙屏书屋初集文录自序》）。黄爵滋的论说、序论、书信、记叙文、游记，往往从高处、大处着眼，特别是奏议，注重国计民生，针对性强，反复申说，多方设譬，屡用排比，气势充沛。

黄爵滋与其友人徐湘潭、郭仪霄、吴嘉宾、杨士达、陈偕灿，形成以抚州、吉州文人为主的群体。徐湘潭才大心细，其文擅长立论而翻新出奇，如“晶霜肃铄”，其对仗则阳开阴合，气象万千，恢宏而精密，纵横而谨严。人以为“世道人心所不可少之文”。陈偕灿的古文，声情并茂。他在《仙屏书屋初集诗录自序》中说：

夫九州大而四海遥，山林奇崛之士，未能遍观而尽识也。然以予生平所知，若徐子东松之严于许可，张子亨甫之宏于裁鉴，郭子羽可之善于激发，艾子至堂之慎于规守，汤子海秋之敏于攻错，门人潘四农之精于审择，家兄寿泉之密于体察，赏奇析疑，肝膈尽吐，故予所

^①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清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57。

就商者，数君为多。

此皆黄氏之知音，虽只是品评诗风，但也可见这一群体在一起作诗论文商榷之频繁。

稍后有“不事摹仿、不求工巧，自然流露”而“见其真”的刘绎（江西最后一名状元）。他后来归故里守孝，遭逢太平军战事，遂未回京城，而是隐居故里，讲学白鹭洲书院。刘绎的古文，以记叙文、序文、书信、墓志铭为主，情真气足，他虽然名重一时，然作文往往目光向下，记下层人物的悲欢遭遇，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

以刘绎为首，形成庐陵文人群体。其弟子胡友梅，古文利落，情深于文。另一弟子龙文彬的古文，“明通透辟，有大纯而无小疵”（何邦彦语）。还有大弟子萧鹤龄，从游三十余年，得其指授，古文明达峻洁。另一弟子何邦彦，何曾一度师从徐湘潭。他关心时局，对江西诗文传统有很精辟的论述或卓识。他下笔有波澜存风韵，气体春容，脉络丝丝相贯，文气畅达。其文“气体清高，议论精警，意主训诫，不为游词蔓语”。刘绎序其文曰：“议论多闳肆，纵横上下，辄成汪洋大篇。其诸小品亦自具风致，盖其用力也专而蓄积也久，故发而见诸言者皆磊落嵌奇，卓然有以自拔也。”还有永新尹继美，学问淹博，论断精确。所撰《鼎吉堂文钞》收有杂著、记、传、表、序、跋、书、祭文、赋，林林总总，情感充沛，嬉笑怒骂中见挚情刚性。其《铁公祠堂记》一篇，深得两汉、唐宋八大家行文之神韵，为人所传诵。萧质斋评曰：“简明精当，歌辞亦缠绵悱恻，崇节阐幽，必传之文也。”龚蒿人评曰：“高古而深韵，文境至此，无懈可击，歌辞尤雅健。”又有泰和萧鹤龄，二十五年游学于刘绎门下。与黄翔云、龙文彬等人切磋文章，学问大进。性嗜书，好古文，他在阅读中对先贤如韩愈、文天祥充满了敬意，同时对时人不当的言论加以辩驳。时人序其文曰：“先生文盤空硬语类昌黎，而神韵逸出于六一翁尤近。”他的游记也写得整饬有文采。同时，他还记载了当时太平军进攻吉安的战事，虽然他是站在太平军的对立面而作，但毕竟留下了一份实录。

桐城文派在江西有支脉，以新城（今黎川）陈用光为首。陈用光所属的江西新城学人群体由姻亲族戚构成，主要成员程度不同地浸渍于姚学，

扩大了姚学的影响。后学如杨士达，羁留京都时，与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姚莹等人交谊颇深。著有《耐轩文钞》。“下笔省净”，桐城姚元之称其文“渊懿其内，廉悍其外，敛而益肆，洁而愈腴”，“叙事文尤详而有体，赡而不秽，简而思深，于欧阳公《五代》、《史记》为近。”宜黄黄爵滋以为其“才近侯（朝宗）、魏（禧）”。汤海秋以为：“韩豪柳洁兼有之，卓然可传。”惜《江西文学史》均未述及杨耐轩与陈溥。

这一时期还有新建县人丁亨，字简轩。其文词简意深，气势宏博，文笔峭削，气韵风生。武宁县人吴觉的小品文，省净简穆而风趣。金溪县赵承恩，为文古直平正。吉水胡宗元，其文劲直。诸家文字各具风格。

同治年间，临川大文人李联琇与江苏吴县人江湜的诗学辩论，是文坛的有名公案。湖口张宿煌，才华横溢，或骈文，或辞赋，或游记，或序跋，不仅为家乡石钟山、庐山风物之美写下不少动人篇章，且因与故友杨辰三之情挚而发为文章，情辞并茂。其时湖口人高心夔，为湖湘诗派的干将，他的散文高古奇崛，纵横排奁，然时有拗口难读之处。永新龙文彬，是一位史学家，他的史论深刻而新见迭出。光绪年间，有以新建勒深之、陶福祝、丰城欧阳熙、瑞金陈炽齐名的四子当时四人很年轻，相交游而相互评诗并论文。编有《四子诗录》。

陈宝箴在湖南推行新法，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他是一位干练大臣，同时诗文俱为上乘。所作《上曾相国书》，郭嵩焘就评说：“此文出笔，兼学韩欧，韩之沉郁，欧之昭晰，与题称也。然如两公遭紧处，觉犹有未至。”

陈炽，字次亮，瑞金县人。始终致力于国家富强，深究天下利病，探寻经国要术，“才雅达时变，有名当世”^①。其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救亡是时代的主题，他常痛惜国弱民穷，认为中国当今首务不在“强兵”，而在“富国”，多次抨击洋务派“兢兢于海防而不知其本原乃在商务”。曾游历沿海商埠及香港、澳门等地，详细考察其政治、经济诸情况，旁考群书，尤重西书，综合心得，撰《庸书》百篇，提出发展工商业，反对列强

^① 陈三立：《清故候选教谕瑞金陈君墓志铭》，《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824页。

把持海关，倡议实行君民共主政体，采用议院制，要求民权等主张。此书经翁同龢推荐，得以进呈光绪皇帝御览，对以后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光绪二十二年（1896），陈炽在重译英人斯密德之《富国策》基础上撰写了一部振兴实业的专著《续富国策》，以深知中国之利病，更求在农林、畜牧、水利、渔业、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寻求改革。其文切于实用，气势充沛，犀利明快。

萍乡文廷式，其文多忧国改制之作。南丰刘孚京，亦一古文大家，极得陈宝箴赞许。刘孚京，字镐仲，南丰县人。为文多政论、史论、学术评论，观点鲜明，气势充沛，擅长用排比、对比，安插骈句，反复恳到以说明之。“深醇朴茂，直追周秦，不袭而入于古。”陈三立评其文曰：“文体博而义醇，涵演渊懿，蹈于自然，终与其县人曾子固氏相表里。”

赣县胡发琅，是一位年仅29岁就去世的英才。他以西学引入传说实学，陈三立序其《肃藻遗书》云：“好学深思，于世所称义理、考据、词章，皆涉其藩，皆旋寓而旋纵之。其志嚶嚶然，其心休休然。尤究切昭代典章制度、生民利病，蘄可施行，其意不至于古之所谓士不止也。”评价甚高。选入本书中的治河诸议即是他关于治水的主张，恺切而情文并茂。

清末民初，陈三立是驰名海内的古文大师。陈瀛一说：“近世以古文为大师者，桐城马通伯（其昶）、义宁陈伯严（三立）其尤著也。尝读《散原精舍》与《抱润轩文》，当知其沉酣经史、笼罩百家。马之严正精洁，尚守桐城师法，陈则雄健挺拔，自成一家之言，亦非可以桐城限之也。”^①

青年陈三立即以古文出名。李肖聃说：“伯严自弱岁名能古文，光绪六年序《鲁通甫集》，年才二十，文已斐然。”^②在长沙时还常与郭嵩焘等切磋作文，其子隆恪等说：“先君壮岁所为文，多与湘阴郭筠仙侍郎、湘潭罗顺循提学辈往复商榷，故去取独谨。”^③光绪六年（1880）四月十七日，郭嵩焘读到陈三立所撰古文一卷，在日记中大加赞赏说：“阅陈三立

① 陈瀛一：《论桐城派》，载《青鹤》1933年第1卷第20期。

② 李肖聃：《星庐笔记》，《散原精舍诗文集》附录“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210页。

③ 陈隆恪等：《散原精舍文集识语》，《散原精舍诗文集》附录“中”，第1217页。

伯严、朱文通次江所撰古文各一卷。次江笔力简括，而不如陈君根柢深厚。其与袁绶纶论《汉学师承记》一书，尤能尽发其覆，指擿无遗，盖非徒以文士见长而已。”

陈三立退居江宁，不少学者、文士、诗人以及名公巨卿后裔请他作序或作墓志。李渔叔说：“及戊戌政变后，中丞被议，散原亦落职，自是乃专以文章名世矣。”^① 郑孝胥在《哭顾五子朋》组诗第四首评论陈三立古文，有如李聃与韩非子之文笔：“江西陈伯严，为文有古姿。他年求下笔，窃比聃与非。”徐一士说：“新城王晋卿与散原年相若，亦同年进士，所为文有盛名，时人以‘南陈北王’并称。王氏著作颇多，特以文家境诣论，似犹略逊于散原耳。”^② 他的古文创作也因而成为其文化活动的重要部分。

从陈三立古文渊源来看，转益多师，终成大家。樊增祥认为其文“稟经酌雅”。^③ 李肖聃转述梁璧园的看法，认为摹仿过欧阳修的文章：“梁璧园焕奎谓伯严诗文初无定主，中年文拟庐陵（欧阳修）。”^④ 此就其文风的迂回婉畅而言。这也许与其父亲的影响有关，郭嵩焘认为陈宝箴《疏广论》“兼有南丰（曾巩）、庐陵之胜……论事理曲折，心平气夷，虑之周而见之远，又足见其所学与养之邃也”。^⑤

陈三立主张文章有变有不变，乃因时代、社会有所变，须以古文之变而融通其同与异者。为马其昶文集作序云：“天地之变，文章之变亦与之无穷，然而非变也，变而通其同异，而后能维百世之变者。”^⑥ 他的古文写人记事，为拯救社会、救治人心而作。涉及面广，上至大臣，下至底层平民，内容充实而丰富。文风清醇而雅健，气遒而格严。有恣肆奇峻的气势、蕴藉夷犹的韵味。

陈三立主张古文创作要有益于实用，在《刘斐村衷圣斋文集序》中说：

① 李渔叔：《鱼千里斋随笔》，转引《散原精舍诗文集》附录（中），第1248页。

② 徐一士著《一士类稿》，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第116页。

③ 樊增祥：《陈考功六十寿序》，《樊山集》卷七，转引马卫中、董珏著《陈三立年谱》第五卷，第346页。

④ 李肖聃：《星庐笔记》，《散原精舍诗文集》附录“上”，第1210页。

⑤ 郭嵩焘：《题右铭文集后》，《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

⑥ 陈三立：《抱润轩文集序》，《散原精舍诗文集》卷十“文集”，第950页。

自尸为新学之风尚炽，见诸文字，例当争言政治，凡非涉富强之术、纵横之策，固皆视为无用之空文，覆瓿之不暇。然古先贤哲儒素声香臭泽，类假而传之，以渐渍于后死者之心，荡摩神识，绵络运会，有在于是，而况君又为天下后世尤所极哀之一人。^①

这里强调的是，新学之风兴起，见诸文字，理应议论政治，而不涉及“富强之术”、“纵横之策”的内容，都是“无用之空文”。并以为古代“先贤哲儒”的言行也都是因其有用而流芳后世，其经世致用的目的性可见一斑。这与他在《廖笙陔诗序》中所说“余尝愤中国士大夫耽究空文而废实用”^②的观点是一致的。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散原精舍诗文集》统计，共189篇古文。青壮年时以书感为主，多是对古代学术的评论，晚年为人所作的诗集序与墓志铭为多。

序跋多为丛书、文集、诗集而作，能探源举要，精义络绎。既有学术性的论断，片言中的，也有对所序者的介绍，往往体现陈三立的文史观及其学术思想。光绪六年（1880），陈宝箴在河北道刊刻王定甫的《龙壁山房文集》。陈三立序中论其文承接桐城派之绪，阐明他对桐城派长短得失的看法，可谓深中肯綮：

桐城家之言兴，相奖以束于一途，固以严天下之辨矣，而墨守之过，狙于意局，或稍无以饜高材者之心。然而其所自建立，究其指要，准古先之言，皆足达其心之淑懿条贯于事物，倡一世于物，则乐易之途，以互殚其能，而不为奇邪诡辨，淫志而破道，阶于浮夸之尤。^③

他认为桐城派文论能严明义理，但过于墨守成规，反而束缚才智之士的发

①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卷八“文集”，第907页。

② 陈三立：《廖笙陔诗序》，《散原精舍诗文集》卷五“文集”，第833页。

③ 陈三立：《龙壁山房文集叙》，《散原精舍诗文集》卷一“文集”，第765～766页。

挥。他指出为文的理想境界，应是既能不违先哲之言，又能抒其淑懿之心志。这也正是他努力的方向。此文既出，为并时古文家所称赞，也可印证前所引诸人的看法。

陈三立在国势衰微、列强窥伺之际，主张士人要研究实用之学，而非凭意气盲目排外，也不能束手无策，收入本书的《廖笙陔诗序》中即深刻指出，士大夫如果将精力用在苟且偷生、夸饰斗捷方面，想要消弭外侮、匡救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变今之法，矫今之习”。

在《书韩退之柳子厚墓志铭后》一文中，他痛心地写到“衰世情伪”、“忧患观变”。柳子厚佐助王叔文，想要收回宦官兵权，立不世之功，失败后反而承担恶名，连友人韩愈也说他“不自贵重”。如此，“吾恐灰志士之心，塞公尔忘私、国尔忘家之义。……兹则为所大惧，而天下万世之所极哀也”。这也说明他对官场社会不思进取、习于敝陋风气的愤懑。

又有《杂说》五篇，或因人因事而作，都是以具体场景、某一侧面寄托针砭时弊之心。第一篇，反对有人认为国家治政在得人之说，认为重要的是建立法纪社会，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二个能人的出现，否则难免混乱。第二篇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4）秋大旱，老农向他诉说“饥且死，而科征不可缓，死益无地也”。慨叹“法益弊而吏益巧”，制度败坏，官吏诈巧，更使百姓陷于憔悴不获喘息的惨境。他把败坏的宪法比作陷阱与毒草：“故弊法不可守，犹陷阱之不可迹、毒草之不可尝也，其受害至痛也”。一旦有人提出要改革法制，就会有人反对，说是“藐成宪也”、“莠言乱政”。批判犀利。第三篇记西山豺狼先后啖食行者、二小儿、一老妇人，可是族人畏豺，邻人认为那是人家的儿子，里正认为不关他的职事，老儒以为豺乃神兽，不可杀害。作者愤慨指出这样下去，恐怕是将连族人、邻人、里正与老儒统统吃掉。以寓言讽刺那些祸不关己、最终也将为祸所害的人。

陈三立所作记叙文讲求气韵，受韩昌黎影响，而此类文章则有柳宗元峭洁文风的影响。如《靖庐记》先总写其地方概貌，继写墓地之所与其旁筑屋之状，以及取名之由。可谓叙次整饬而简洁。接着写到靖庐与父亲的关系，其中有对其父为政的叙述。父逝之后，他痛定思痛，在此文中追溯当年推行新法的动因与经过：“初，吾父为湖南巡抚，痛腐败无以为国，

方深观三代教育理人之源，颇采泰西富强所已效相表里者，仿行其法。会天子慨然更化，力新政，吾父图之益自喜，竟以此得罪，免归南昌。”^①正是由于湖南维新变法的艰难与挫折，使他以前车之鉴作反思。然后换一角度，从吾父处其屋中看周围环境之美：

楼轩窗三面当西山，若列屏，若张图画，温穆杳霭，空翠潏然，扑几榻，须眉、帷帐、衣履，皆掩映黛色。庐右为田家，老树十餘蔽亏之。入秋，叶尽赤，与霄霞落日混茫为一，吾父澹荡哦对其中，忘饥渴焉。

描绘生动如画，一个勘破生死大关的旷达老人与此环境何其相契，料想不到的是而今一切都变了，似是而非的恍惚情景与昨日空旷宜人的境界形成鲜明反衬：

尝登楼迹吾父坐卧凭眺处，耸而向者，山邪？演迤而逝者，陂邪？畴邪？縹邪？縹而幻者，烟云邪？草树之深以蔚邪？牛之眠者斗邪？犬之吠、鸡之鸣邪？鹄鸱群雉之噪而啄、响而飞邪？惨然满目，凄然满听，长号而下。已而沉冥而思，今天下祸变既大矣烈矣，海国兵犹据京师，两宫久蒙尘，九州四万万之人民皆危蹙，莫必其命，益恻彼，转幸吾父之无所睹闻于兹世者也。

先写所见之模糊、所听之幻觉，正是作者哀而疑虑心境的外化。连用九个“邪”字作反问，用排比句式表达其痛苦感受与抑郁情怀，写幽寂之景，兼写孤独之人，情景相融，每句字数或长或多，构成迂回顿挫的气势。然后言今之世非吾父所见之世，反而活着不如早死，写出他对当前局势极端的畏惧感，融入深沉的身世之感、家国之恨，低徊凄惋之情，动人心弦。

铭文既有圻志铭，也有哀祭诔文，如《故妻罗孺人哀祭文》《祭于晦若侍郎文》《祭易实甫文》均附有铭赞。概写逝者之生平，寄托作者之哀

^①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卷六“文集”，第858～859页。

痛。夹叙夹议，每句四言，间有七言或用骚体，讲求押韵。情文并茂，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陈三立古文之成就卓著，在能承前人之所长，深造自得，刻苦经营。吴宗慈曾记他论作文之旨：“应割爱，由篇审段，由段审句，由句审字，必使词不泛设，字无虚砌。”^①此外，其成就还与其家学、交友以及人品之峻洁、见识之卓犖有关。

其时还有李瑞清，临川人，学术渊博，精通中西文化，诗书画皆工。其序跋诸文字乃精气所凝，奇倔劲健，洵为大手笔。

清末民初，新昌（今宜丰）胡思敬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一位大家。他在北京做御史时即以耿介敢言著称，其奏议针对清官场的腐败，即有理有据而又引史为鉴。他勤于著述，如《国闻备乘》《戊戌履霜录》等，留下历史风烟的印记。还在清末亡时就毅然挂冠归故里，后又来南昌建问影庐藏书、搜书、校书，不遗余力，刊刻《豫章丛书》。他写有大量的政论、传记、书信、序论，其气盛言宜，劲峭犀利，观点鲜明，江西人以文章节义著称，在他身上似乎得到了验证。

以胡思敬与南昌人魏元旷为中心，包括都昌黄锡朋、临川黄维翰、以及与胡思敬并称“西江两御史”的南丰饶芝祥，还有稍后的都昌胡雪抱等，所谓民国初年的江西遗老遗少，他们的心态大抵是，有志于事业，而形势所迫，“不志于潜而终潜”（魏元旷《潜园后记》），只有隐居以荷节操，作文以寄托自家志趣，企图维护道统于不坠。他们声气相求，并由此而形成民国初年的江西古文群体。诚如黄维翰所说：

懷亡國改物之忱，發為痛哭流涕長太息之言，既不獲從龍比游，則吞炭茹荼以終其身，此退廬胡子之行也；“韓亡子房憤，秦帝魯連耻”，雖曉然知其不可為，力而猶庶幾于萬一，此潛樓劉子之行也；其進也，不為仕榮，其退也，不為名高。人皆驚所徇，我乃立于獨，此持庵華子之行也。俛俛乎其身，皇皇乎其心，不拘牽于尋常繩墨之論，而卒蹈乎大方，此劍秋吳子之行也。謂以中國之道，治今日之中

^① 吴宗慈：《陈三立传略》，《散原精舍诗文集》附录（上），第1198页。

国，不假外求而自裕，日发挥而张皇之，修之其身，传之其徒，忽忽乎不知老之将至，此潜园魏子之行也。之数子者，予咸与之友，尝上下其议论，而潜园年最长，咸兄事之。^①

此段引文分别提到胡思敬、刘廷琛、华焯、吴剑秋、魏元旷等江西籍的清遗老。知其心态性情，写其志节操行。

魏元旷也是一位著述大家，早年在京城作官，即与胡思敬结为好友。民国初年，胡思敬邀请他来退庐一道编刻《豫章丛书》。胡思敬未待书刻完即去世了，剩下的工程即由魏元旷克底于成。他所著《潜园文集》，量多质高，较胡思敬的恺切激昂而不同的是，他的古文娓娓婉达。收入本书中的魏元旷作品，以传记为主，但传主非当时的重臣、名家，而是一系列的下层有作为的士绅，或有才华而不得志的读书人，写来栩栩如生，再现清末民初的社会生活情景。他的一些小品文，清雅别致，堪供品味。

崇仁黄维翰，其史学、文学兼擅，其史论，气息深厚，颇似欧阳修《五代史》小序。因其曾在黑龙江作官，作有《黑水先民传》诸作，考证黑龙江一带地理形势与女真族习俗。其文峻伟朴茂，气骨味三者逼近秦汉古文，雄奇似韩昌黎。《魏潜园七十寿序》，文法从《庄子·天下篇》脱胎而来，笔法苍老。《灵谷云海图跋》以写景为主，奇境奇文，较柳宗元游山诸作，尤为雄壮。令人心旷神怡。

黄锡朋的《蜚庐文略》，其中既见作者史学见解，亦表现其文学美文的细节描写。同时还是研究乡邦文化的珍贵资料。可以了解都昌、湖口一带耕读人家如何起家并进而通过科考走向仕途的艰苦历程。了解到乡村社会人们的生活状态，特别是都昌人到景德镇业陶活动的一些缩影。他的书信整炼迢雅，笔蘸深情，结语折旋以达，得欧阳修古文之态，令人涵泳低徊无尽。所作寿序得作文布置之法，往往在开篇提醒眉目以著笔，振荡而下，词旨警切，不支不蔓，笔法学古，得韩吏部之雄健，有苏玉局之畅达，节节转换，渐入佳境。末乃揭示主旨，笔意超拔而灵动。他的书信见识远，有如高屋建瓴。得楚骚之遗意，有孟子之笔意。条次整雅，昭晰婉

^① 见本书黄维翰《魏潜园七十寿序》。